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特刊



第三章

党的女儿

瞿独伊：让世界聆听开国大典盛况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阳晨

瞿独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烈士之女，出生于1921年11月，1946年8月入党。瞿独伊曾在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作为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赴莫斯科建立新华社记者站，其间多次担任周总理和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瞿独伊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

赓续红色基因 传承父辈使命

瞿独伊一路见证了党的风雨历程和艰苦岁月。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年幼的瞿独伊随父母一起到会，曾为父亲做掩护，休会时为父亲表演。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且健在的只剩下瞿独伊。

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为了避免国内白色恐怖的残害，同时也考虑到带着孩子从事地下工作不方便，他们将瞿独伊继续留在原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

“独伊怎么样？我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处理的时候，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瞿独伊。1935年秋的一天，瞿独伊和儿童院的同学们到乌克兰的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旅游，她偶然从《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瞿独伊顿时头晕目眩，失声大哭，当即昏倒在地。

父亲给予瞿独伊爱国教育的第一课是在俄罗斯生活期间，瞿秋白寄给女儿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我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这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高尚人格的表现。”在后来的采访中，瞿独伊被问道，“爸爸妈妈教会你什么？”她说：“爱祖国！”

瞿秋白牺牲后，瞿独伊常常回想起和父母相伴的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的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这样的力量伴随着瞿独伊坚定地踏上了革命道路。

因苏德战争爆发，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跟随母亲回国，到达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审讯中，敌人以诱惑的口吻说：“你还年轻，只要答应我们，出狱后会很快给你找一份工作。”瞿独伊愤怒地回答：“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们无罪！你们必须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延安！”在狱中，狱友们开展党组织生活，瞿独伊旁听，这让她在自己入党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为共产主义奋斗”成为她毕生的信仰。

1946年6月10日，瞿独伊一行人获救并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瞿独伊和丈夫一同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作为俄语播音员，瞿独伊在天安门城楼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了毛泽东的讲话。“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很兴奋，能够向全世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觉得很光荣。”瞿独伊说。

克己奉公 一心为党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资料显示，1950年，瞿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被派到莫斯科去建立新华社记者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独伊和李何也成为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

1950年3月12日，恰逢苏联第三届最高苏维埃选举投票日，为了使每一位选民都有投票的机会，在前往苏联的火车上也特别设立了选民投票箱。正在赴任途中的李何和瞿独伊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发现这一情形之后，立即对同行的苏联旅客进行了采访，了解他们对此次苏维埃选举的感受和看法。这条消息后来成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发自国外的第一篇新闻。

1950年10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盛典，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先后向国内发回10多篇消息和通讯，反映了苏联人民对新中国的友好和热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缺少俄文翻译，因而有代表团访苏时，常常借瞿独伊去当翻译，甚至周总理访苏，中国驻苏使馆张闻天大使举行宴会和在群众场合讲话时，也由瞿独伊当翻译。莫斯科分社在瞿独伊夫妇的努力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瞿独伊后来回忆：“在莫斯科，我们身兼数职，既是记者、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打字员、翻译，甚至还是会计、大师傅、采买员，各种零七八碎的琐事无不分散我们的精力。有一次，我们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刚好赶上大雨，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还得走一大段路，到他那里后衣服、鞋子全湿透了。谈起工作，他说你们有些事情不必亲自跑，写封信派人送到外交部收发室即可。当得知我们既没车子又没有通讯员时，不禁哑然失笑。我们向他解释：中国目前要厉行节约，一切力量都要放在建设上。”

瞿独伊不仅在工作中注意节约，在生活上也同样要求自己简朴，在给她定薪时，她主动减掉700卢布。当时记者站所用的电视机、收音机和照相机都是自费购置的。瞿独伊生病住院费用要比苏联公民高三四倍，未向公家报销。在国外工作期间，所得稿费绝大部分她都交了党费。

1957年，瞿独伊夫妇奉调回国。他们离开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队伍包括译电员在内共有4人，大小车辆2部，各类通信器材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瞿独伊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在建党100周年到来之际，这位与党风雨同舟、命运共进的老人，回首过去，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永不褪色。

（根据新华社、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编写）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丁秀伟

黄宝妹家珍藏着一张老照片，是周总理接见她时被拍下的一幕，这张照片成了她家的传家宝。“我要发动大家一起，努力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承担老党员的责任。”如今90岁的黄宝妹依然这样说。

黄宝妹1953年成了第一批全国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先后7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模；3次出席国际会议；8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8年，著名导演谢晋根据其事迹拍摄了同名电影《黄宝妹》，影片中她本人饰演黄宝妹，是那个时代的工人明星和时尚偶像。

从童工到劳模，她是新中国发展的“参与者”

1931年，黄宝妹出生于上海浦东高东乡麦家宅，她家里很穷，作为老大，12岁时黄宝妹就跟随母亲贩盐卖。

13岁时，黄宝妹成了童工，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前身——日资的裕丰纱厂。“我记得很清楚，报名是年初四，第二天就正式上班了。我被分配到细纱车间，一天工作12个小时，白班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夜班从晚上6点到次日早晨6点，一个星期倒一次班。”

那时的交通远没现在这么方便，如果清晨6点上班，黄宝妹凌晨3点就要从家里出发。

她暗想，哪怕再苦再累再屈辱，“技术一定要学到手。”经过勤学苦练，她做到了“挡车400锭”，而一般工人只能到270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黄宝妹回忆，马路上到处是解放军，“劳动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在新的上海国棉十七厂，黄宝妹迎来了重生，“当时我想，既然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纺纱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就拼命干”。

全厂细纱车间的挡车女工中，就数黄宝妹的皮辊花（又叫白花，是指粗纱进行细纺时，由于纱线断头而卷绕在皮辊或绒辊上的棉纤维）出得最少，浪费最少。她纺的二十三支纱只有0.3%，位居全厂前列。

爱动脑筋的黄宝妹还探索出一套“单线巡回、双面照顾、不走回头路”的先进操作法，扩大看台能力，每个人从看400锭扩大到800锭，节约了车间三分之一的人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不仅如此，黄宝妹还首创了“逐锭检修”法，这样就可以及时调换歪锭子，改善机械状态；为减少牵伸部分的飞花，保证棉纱质量，黄宝妹还与人一同研制了一种“红芯子”（集合器），使皮辊花大大减少。

黄宝妹成了纺织行业的带头人，1953年成为第一批全国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她管理的二纺细纱车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集体，并且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与此同时，进厂时还是文盲的黄宝妹，也进了厂办的业余学校，得到了读书机会，“刚进工厂，我一个字不认识，后来还是通过学唱歌认了超过20个字，考上了夜校的小学3年级。只要有空，我就用来学习——上班前的时间、吃饭休息的时间、下班后的时间，后来考了90分以上，跳级到5年级，然后又跳级到初二。”

之后，她又进了东华大学（时名华东纺织工学院，简称“华纺”）开办的“干部特别班”。“我的基础太差，一开始老师上课我跟不上。但既然来学了，就要学好。别人读一遍，我就读两三遍，晚上也比别人睡得晚，星期天也不回家，就在学校补课、学习。”

后来第一年学业考试，30个人淘汰11个人，黄宝妹通过了，她是班级里唯一一个继续攻读大学的工人，并在两年后取得了毕业证书。

在以她名字命名的电影中饰演自己

为了用镜头留住全国劳模的真人真事，1958年，谢晋导演和摄制组来到了国棉十七厂，拍摄黄宝妹的故事，并决定让她“自己演自己”。

当时她紧张得不得了，“第一天拍大扫除，连走路都不会了，一个镜头连拍了8次，一想到浪费那么多胶卷，心里就特别不好受，我这个人最看不得浪费了。”

谢晋导演和蔼可亲，耐心开导她，黄宝妹对镜头也慢慢习惯了起来，电影顺利拍完。电影公映后，大家都夸黄宝妹演得好，甚至还有人提议她“弃工从影”。

黄宝妹说，当时电影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片在北京放映，周恩来总理请电影主要演员吃饭，“我就和周总理坐在一起，当时文化部有人向周总理提议，说我演得好，可以让我改行拍片”。

黄宝妹一听一下紧张了，马上说，“我不行的，拍电影连路都走不好”。黄宝妹心里清楚，她不是专业演员，导演对她要求不高，“要是做专业演员，要求就不一样了，连跑龙套都轮不到”。

黄宝妹一直相信“专业精神”，而她的专业领域就在车间。为此，她也放弃了当厂干部的机会。

1957年，黄宝妹被调任厂工会副主席，“我有技术，在办公室里就浪费掉了，就主动要求调回车间。”

就这样，黄宝妹一直在车间工作到1986年55岁退休前夕，她觉得很满足，“因为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她是新中国发展的“奉献者”

黄宝妹退休后，始终坚持“党员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是不退休的。”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为启东筹办纺织厂出谋划策。

1994年黄宝妹集资办起了英豪科技实业公司，用获得的利润来帮助困难劳模。回归社区后，她发现社区治理困难重重，小区业委会建不起来，作为共产党员的黄宝妹重新拿起了劳模时期的钻研精神，和其他党员志愿者挨家挨户了解并精准地找到居民需求，用绣花般的功夫解决了社区治理的大难题。

疫情期间，已经90岁的黄宝妹充分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社区带头并且号召小区的居民一起捐款。

黄宝妹在杨树浦生活了一辈子，也见证了杨树浦路沿江工业带的历史变迁。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杨浦滨江，同老党员、老劳模黄宝妹亲切交谈。黄宝妹激动地说：自己见证了上海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再到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感到无比自豪。如今，黄宝妹身体依然硬朗，健步如飞。她依旧发挥余热，带着她“不忘初心”的故事，走遍社区和企业，作报告，上党课，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号召发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为国家的建设做贡献。“我要发动大家一起，努力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这是一个老党员的责任。”黄宝妹说。

黄宝妹：让「全国人民穿好衣」